



欧洲病，世界病

欧洲正在发生的新闻，其实是一场反全球化的“倒春寒”

稍微关心点国际新闻的人，都会发现近一月来的世界尤其是欧洲异常之乱。上月底，英国宣布脱欧，在全世界惊愕目光的注视下与欧盟打起了“离婚官司”。7月14日，法国城市尼斯在国庆日当天爆发血腥恐袭。还没等该新闻充分发酵，15日的土耳其未遂政变又夺去世界公众的注意力。

英国、法国、土耳其，一个是欧盟中“脱欧派”的急先锋，一个是“欧洲梦”的主心骨，外加一个总想加入欧盟却不得其门而入的“仰慕者”。这三个各具特色的欧洲国家半个多月里同时爆出大新闻，我们不能不问，欧洲到底怎么了？如果再把时间拉长些，对欧洲近几年来发生的变化进行一次“复盘”，你会发现，欧洲的“病因”远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。甚至可以说，欧洲正在罹患“疾病”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全世界传染。



英国“脱欧”公投结束后，支持“留欧”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。



尼斯恐袭发生后，两名幸存者在事发现场紧紧相拥。



土耳其未遂政变中，群众站在一辆坦克上。

本报记者 王昱

全球一体化让富者更富

2014年，当欧洲难民危机尚未爆发时，一本纯经济学书籍在世界舆论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这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·皮凯蒂所著的《21世纪经济资本论》。该书引起学者、媒体乃至公众热议的，是皮凯蒂提出的一个“不等式”。他总结了人类近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史，发现在近三百年的大多数时段，资本回报率都恒大于生产总值的增长。说得再简单些，就是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以一种不可逆的趋势被拉大。

皮凯蒂这一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的观点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学界是十分“离经叛道”的，因为它挑战了著名的“库兹涅茨曲线”理论，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时代早期那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只是暂时的，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，收入分配状况会逐渐改善，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。可以说，“库兹涅茨曲线”描绘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美妙梦境。

然而，与《21世纪资本论》一样，现实却毫不留情地打了这个梦的脸。乐施会2015年公布的报告指出，就在2016年，全球会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，占全球人口1%的最富有者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世界总财富的一半，他们将比剩余99%的人加在一起还富有。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奇景。

那些1%的富豪们究竟是怎样完成资本集聚的呢？经济学者给出的答案是“全球化”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全球化进程让资

本开始像水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。资本持有者们撤去发达国家的生产线，裁掉薪水过高的“工人贵族”，前往世界彼端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廉价劳动力，等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价格随着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，资本又再次出逃，寻找新的“劳动力处女地”。正是这种“舍高就低”，结束了西方尤其是西欧“高薪工人”的童话时代。德国《经济新闻报》不久前撰文指出，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旗手，德国同时也是欧元区区内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。德国政府的贫富状况报告显示，占德国人口十分之一的有钱人拥有德国私有净资产的53%，而占德国人口半数的低收入家庭拥有的财产比例只有1%。而整个欧洲范围内，越是融入“一体化”进程的国家，贫富分化的现象也越明显。

在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中，人类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悬殊的奇景，而那些被富豪们甩开的“99%”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在美国，他们发动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，而在欧洲，掺杂了宗教、政见、种族等多种复杂因素后，另一些事情理所当然地发生了。

秒变恐袭犯 底层在躁动

在全球贫富差距拉大的大潮中，欧洲一直是一个“逆流而动者”，其所坚持的高税收、高福利政策一直试图弥合阶层之间的差距，创造一个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“伊甸园”。然而，人类的发展史证明，当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时，那些现实中的乌托邦和“地上天国”，往往是最先被攻破的。

对于欧洲来说，这种打击来

自近在咫尺的中东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经济环境原本就不健全的中东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分化，尤其是埃及、叙利亚等非产油国，在之前的经济发展中受到恩惠的是一部分精英阶层，多数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没有享受到改革的好处。相反，通货膨胀导致后者的生活水平下降，青年失业率高于50%。这些矛盾最终点燃了“阿拉伯之春”。

燃烧的战火给了这些长期盘踞在底层的青年们向欧洲移民的动力，这些底层民众梦想在相对公平的欧洲获得比在本国更好的收入。据欧盟估算，在目前前往欧洲数以百万计的“难民”中，有50%至70%是这种“经济难民”。欧洲难民危机，本质上是一次中东底层民众向欧洲的大规模迁移。然而，正如前文所述，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世界性的，大规模的难民潮并没有满足新来者的“富裕梦”，反而让欧洲底层社会的空间变得更加拥挤、焦躁。

7月14日的尼斯惨案，其实是这种焦躁的典型体现，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，凶手穆罕默德·布莱勒几乎不符合任何原教旨主义者的形象。他酗酒、家暴、乱性、吃猪肉、吸毒，直到半个月前还不了解任何伊斯兰教经典，直到八天才开始蓄须。从他身上，人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失败者形象，而在惨案发生后“伊斯兰国”所发出的声明中，该极端组织却将布莱勒称为“圣战士”。这个尊贵称号与布莱勒实际境遇之间的反差，也许正是布莱勒“秒变”恐怖分子的真实原因。

“一个人越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，就越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、宗教、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。”英国人埃里克·

霍弗曾如是说。只有挥舞着“国家、宗教、种族”的大旗，那些在现实中被挤压得无处可藏的失败者们，才会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大写的人——这一点，不仅欧洲如此，举世皆然。

政变与公投 阶级在分裂

与法国的恐袭相比，土耳其与英国的“症状”虽然更复杂，但病根却是一样的。

近20年来，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着5%的年均增长率，然而在发展的表象背后，分配的不公却越发严重。作为全力与欧洲接轨的国家，土耳其增长的红利大部分被少数城市精英、军人所吞噬。而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农民则至今仍保持30%以上的贫困率。这种不均衡分配给了亲宗教势力做大的机会。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原本在宗教派和世俗派之间摇摆的中间阶层因为经济地位沦落，最终倒向了宗教派，这一变化让亲宗教的正义与发展党一下子获得占总人口30%的选票。土耳其的“宗教化回潮”自此加速，并最终诱发了这次政变。

既然正在发生的种种怪相都能归因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底层躁动，那么精英们是否存在与“草根阶层”进行协商的空间呢？从不久前英国公投中所展现的情况看来，情形不容乐观。

长久以来，英国民众之所以被视为欧洲最理性、最有民主素养的一群，原因在于英国曾存在着庞大的“工人贵族”阶层。自18世纪中后期起，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就一直保持在欧陆工人的1.5-2倍之间，正是这种高薪，稳住了英国政治的基本盘，让英国躲过了20世纪各类政

治风波。然而，这种“工人贵族”传统在二战后便因大英帝国解体而破产，上世纪70年代“入欧”后，经过欧洲一体化的洗礼，在GDP数据依然亮眼的表象下，英国已经从原先的“世界工厂”蜕变为金融中心，少数金融精英和服务业的大量底层工作者成了英国贫富分化的两端。

此次脱欧公投，对于英国很多底层民众而言，不仅仅是为了从外来移民那里抢回工作岗位、收入和福利，还是对主流政治、对卡梅伦政府、对社会精英和有钱人的宣战。在这一点上，英国《卫报》的“脱欧公投：欢迎来到分裂、愤怒的王国”视频让人印象尤其深刻。视频中，在距离曼彻斯特市中心仅10分钟车程的破败的工人阶级社区，两位大婶指了指市中心方向说，“如果你有钱，你投留欧”，接着又指了指自己，“如果你没钱，你投脱欧！”

英国底层民众其实把账算得很清楚，留欧也许的确能让英国总体上更繁荣，但这种繁荣与他们何干？他们所见到的只会是繁荣红利被精英所吞噬，而他们的工作职位却会被外国移民抢走。所以，主流媒体和首相一遍遍宣传的“大道理”对于这些“脱欧派”们毫无说服力。在与欧洲“离婚”之前，英国上下阶层之间已经分裂了，这其实才是最危险的信号。

正在欧洲发生的新闻，其实是一场反全球化的“倒春寒”。它向我们揭示的残酷事实是——全球化、区域一体化这些看似美好的词汇，其实并不有利于所有阶层。2016年，当全球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跨过了那个危险的临界值，来自欧洲的警报已然响起时，在这警报声中，全人类又将何去何从？